

新中国成立初期唯物史观史学话语的阐扬与确立

——论三联书店历史类学术图书重印、增订与新版的价值

叶建

(温州医科大学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温州, 325035)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三联书店作为出版业公私合营的样本, 逐渐确立将学术图书出版作为主要业务方向。在它出版的学术图书中, 历史类学术图书占据颇为重要的位置。随着出版社性质和学术图书需求的变化, 三联书店历史类学术图书的出版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在 1949 年至 1951 年独立出版社自主开展编辑出版业务时期, 以重印和增订为主; 在 1952 年至 1957 年人民出版社“副牌”内设编辑部时期, 以增订和新版为主, 而且此时新版图书在种类上逐渐超过增订版图书。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些历史类学术图书在繁荣当时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唯物史观在史学界主导地位的确立方面, 有着自身独到的价值和贡献。

[关键词] 三联书店 学术图书出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23)01-0100-09

Reprint, Supplement and New publication : On the Publication of History Academic Work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dership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 Jian

(Institute of Urban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Abstract] AS a model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gradually focused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cademic work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its academic publishing activiti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istory academic books took up a position. Due to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and the public's demand for academic 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between 1949 and 1957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In the phase between 1949 and 1951, which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had th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 with its own editorial operations, it focused on the reprint and supplement of books. In the second phase between 1952 and 1957, which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was the secondar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t transformed to publish the supplement and the new edition of books, meanwhile the new editions had gradually exceeding the supplement in spec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history academic works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sperity of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and the domin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cademic works publication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ourse

DOI:10.13363/j.publishingjournal.20230113.002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19ZDA33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叶建, 历史学博士, 温州医科大学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作为集中反映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长期受到学者和出版界的重视。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出版机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与学术图书出版有着极为深厚的联系:新民主主义时期,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3家党领导的进步出版机构,出版了一批学术图书,“启发广大的落后读者走向马列主义的道路”^[1];新中国初期,三联书店服务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积极充当“私营书店的模范”,推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校补充读物等”的出版^[2];与人民出版社合并成为其“副牌”后,于1954年至1957年间重建编辑部,不仅“有独立的编辑方针和计划,以便更加广泛地联系组织作家,达到培养和鼓励学术著作的目的”,而且“翻译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古典著作”,过去各书店出过的学术著作和译本,也“加以挑选,整理重印”^[3]。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0月至1957年12月底三联书店图书出版业务中,学术图书占据了较大比重,大致有160种,历史类学术图书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约为80种,涵盖研究专著、人物传记、论文汇编和个人文集等文献形式。基于三联书店在新中国初期独特的业界地位,为何要出版如此多的历史类学术图书,其中与社会、政治互动的关系如何,以及这批图书对当时唯物史观话语学术体系的确立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问题,均有必要展开探讨。

1 独立出版社时期历史类学术图书出版的重印与增订(1949—195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作为党领导下的重要进步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图书,“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4]。随着全国解放的曙光初现,三家书店的出版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1948年6月,周恩来致电章汉夫、胡绳,要他们转告3家出版机

构负责人,将编辑主力和资本转移到解放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通俗读物的出版上,特别要“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向工、农、兵、学生、店员、贫民等介绍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及新文艺”^[5]。当年10月,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开始在香港筹划合并为三联书店,提出要“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编行文艺、科学、教育、妇女等各方面的,高中、初各级指导学习的,以及学术的各种定期刊物”,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在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做新的贡献”^[6]。1949年3月,三联书店总处在迁往北京后意识到其原有出版方针的局限性:“幻想着独立自主的老一套的做法,没有了解解放区的文化事业的具体情况和方针,仅凭自己的主观和旧的经验设计了一大套方案,等到一进入解放区才感到这些方案与现实不相符合了。”^[7]为此,三联书店结合解放区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实际,迅速调整业务板块,决定把“旧有出版物加以整理,继续发行”^[8]作为尽快着手的工作,确定了“以审读再版书为重点”^[9]的出版任务。

1948年5月至1949年10月间,三联书店及其副牌机构新中国书局、光华书店等重印出版了一批历史类学术图书。跟之前版本比较,这些历史类学术图书重印本在内容方面几乎没有变化,见表1。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联书店坚持将重印学术图书作为工作重点,并把“出版理论研习的中级读物,帮助干部提高其思想政治水平”^[10]列为1950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草案编辑出版的7大内容之一。在1951年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历史类学术图书有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册)、曹伯韩《世界历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上下两册、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

表 1 新中国成立前后生活书店及其副牌书店重印的历史类学术图书一览表

| 作者 | 书名 | 1948年5月前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及其他副牌书店版本 | 1948年5月至1949年10月三联书店及其副牌书店版本 |
|------------------|----------------------|---|---|
| 吕振羽 | 《简明中国通史》 | 无 | 1948年5月大连光华书店初版, 1949年1月大连光华书店再版。 |
| 陶官云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 | 无 | 1949年1月哈尔滨光华书店初版。 |
| 翦伯赞 | 《历史哲学教程》 | 1938年8月生活书店初版; 新知书店1938年8月初版, 1939年3月再版, 1946年2月3版, 1947年10月修正4版。 | 长春新中国书局1949年4月再版, 辽东新华书店1949年8月初版。 |
| 吴泽 | 《中国历史简编》 | 重庆峨嵋出版社1945年7月初版, 1945年11月上海再版, 1947年10月大连1版。 | 峨嵋出版社1949年1月上海6版; 长春光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 长春新中国书局1949年出版。 |
| 杜守素 | 《先秦诸子思想》 | 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9月初版, 1947年6月再版。 | 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6月初版。 |
| 范文澜(又名武波) | 《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 | 上海读书出版社1947年10月初版。 | 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6月出版, 香港新中国书店1949年出版。 |
| 侯外庐 | 《中国古代社会史》 | 无 | 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8月初版。 |
| 侯外庐 | 《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 古代思想编) | 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8月初版 | 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8月初版。 |
| 范文澜(原题: 中国历史研究会) | 《中国通史简编》 | 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7月初版。 | 新中国书局用新知书店1947年版本纸型于1949年重印,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则依据延安新华书店1941年9月版本于1949年7月重印。 |

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李长之《李白》、杨荣国《孔墨的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图书以重印为主, 且不少是尝试采取了增订出版的方式, 如华岗《社会发展史纲》1949年12月版是以重庆生活书店1947年版为基础增订出版,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950年8月版是以光华书店1948年哈尔滨版为基础增订出版, 而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1950年5月版是根据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增订出版的, 该增订版删去了生活书店版序(即新版序言)、附论3—7关于旧经济学批判等内容, 增加了《解放后新版序言》《旧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的总考察(作为附论3)》等章节。

这一时期, 三联书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图书的出版之所以采取重印, 而非出版

新书的策略, 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最主要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符合要求的新书稿源较为紧张。从作者层面看, 三联书店长期依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人, 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高校、社科院等部门行政职务, 平常事务繁忙, 难以有时间坐下来写作。从编辑层面看, 三联书店编辑人员变动较大, 胡绳、陈原等资深编辑走上了各个行政岗位, 新的编辑力量一时难以跟上。1950年, 三联书店编辑部史枚承认说:

“我们估计阅稿每天一般可做二万至三万字, 新稿2700万字, 即须900至1350工; 估计批稿每天一般可做七八万字, 即须338至386工。而事实上, 稿件的审阅, 尚应包括应退稿件和旧书、再版书的审阅, 所需工力自

然要加几倍。做技术性编辑工作的同志，也还要兼做编审部的秘书工作。现在我们在图书编审方面，北京有专任编辑三人，上海有专任编辑三人，助理编辑二人。以这些人力言，的确是不够的。”^[11]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外，做出重印出版的选择，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深厚的历史积累。3家书店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出版马克思主义进步书籍为己任。这些进步书籍的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过时，仍有其出版价值和客观需求。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掀起学习社会发展史热潮，“以此作为改造知识分子，建立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的初阶”，而1940年出版的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对于人们学习了解社会发展史“有可供参考之处，惟内容需要加以增订”^[12]。

至于采取增订这种出版形式，主要是当时学术发展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先前出版的很多原著，有些内容不适合新的时代要求，需要加以修订。据时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总经理邵公文分析，“过去三店曾出了一千几百种书，其中大部分都已失掉时间性，或观点上有些问题不适合目前的情况。所以都需要重新审阅。当然其中有一部分马列主义译作和古典文学名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些因为在蒋区避免被查禁故意弄别扭的，如把列宁的名字写成伊里奇，把斯大林的名字写成药瑟夫等等，在今天就无此必要，也应加以修正。”^[13]对这些问题，出版方和著作者都有敏锐的洞察力。比如，华岗就认为，他在解放前撰写出版的学术图书因写作时间仓促，史料考证不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如《社会发展史纲》属于纲要性文字，由于初版时比较仓促，后虽经1946年再版时略有修改，但“终以缺乏充分时间和必要史料，所以依然存在着许多缺点”^[14]。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在初版时也因作者身处抗战后方，“史料搜集不易，加以工作紧张，写作

时间短促，以致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不免有些草率，许多待考的史料，一时都不及考证”^[15]。

2 人民出版社“副牌”时期历史类学术图书的增订与新版（1952—1957）

1951年底，三联书店编辑部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并作为该社的副牌，继续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对于三联书店的出版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出版总署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全国出版工作事业发展问题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建立编辑制度问题上，人民出版社应特别严格，作为全国出版界的模范。人民出版社今后拟不出任何可有可无的不够标准的书籍，遇有这类书籍即介绍给三联书店或其他出版社出版，以便保持最高的水平”^[16]。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批示“同意”。其后三联书店的出版业务即以此为原则加以制度设计，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学以外的一部分财经书籍以及不适宜以‘人民’名义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所谓‘政治经济学以外的一部分财经书籍’系指：国民经济计划、货币、财政、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一般原理，不属这个范围的其他财政书籍，如贸易、合作、会计、统计……等等，希望由其他出版社分担）”^[17]。

但是，此后的1952—1953年间，三联书店在人民出版社内部实际上既无单独的编辑部，也没有独立的编辑计划^[18]，导致其学术图书出版业务大量萎缩，无论图书重印还是新版书出版都很少。据不完全统计，大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即1952年出版了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修订版、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1953年出版了游国恩《屈原》、邓广铭《王安石》和黄绍湘《美国简明史》。之所以会这样，一是人民出版社仅选择三联书店以往出版物的“一小部分”加以重版，其

他多数“由作者自行处理”^[19]；二是部分人民出版社编辑对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学术图书不以为然，采取消极态度。譬如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的出版，“这部稿子的作者最初跑到编辑部那里去可以说是受到了极端冷酷的待遇。稿子搁在编辑部中已好几个月，作者去编辑部探问消息时，从一个编辑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书中的语句太欧化了’，从另一个编辑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文字很陈旧，文言词汇太多’。那么究竟出版不出版呢？答复是，让我们再仔细看看以后再说。就这样，这本稿子搁了一年多之后才算是印出来了”^[20]。

这种情况在1954年出现了转变。当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编辑工作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其自成立以来“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21]，要求切实落实在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措施，明确三联书店编辑部的编制仍为“人民出版社的一部分”，但须有“独立的编辑方针与计划”，“以充分发挥现有著译力量”^[22]。对于三联书店出版学术图书的原则和方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这样做，当然不是容许粗制滥造，而是为了在现有的水平上逐步地提高。”^[23]其中特别提及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对许多旧社会出版的学术图书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只要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书籍，三联书店“可酌量选印”；二是对海外学术中文译著也可以选择出版，特别要“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24]按照这一文件精神，人民出版社于1954年下半年设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下设6个编辑组，“有独立的选题计划，对外也不再作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25]。

自此以后至1957年三联书店编辑部撤销前^[26]，三联书店在历史类学术图书出版方面

迎来了短暂的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其间共出版了55部历史类学术图书，其中1954年出版5部，1955年出版16部，1956年出版14部，1957年出版20余部。在这批出版物中，旧书增订比重不断减少，而新书初版的分量不断提升，并在数量超过了旧书增订。从出版物内容来看，出版的新书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学术专著，数量不多，仅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洪焕椿《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杨人梗《圣鞠斯特》等近10部。二是学术论文集，数量较大，具体又分为专题论文集和个人论文专集两类，前者包括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和《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等专题性质的论文集，后者有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尔纲《太平天国记载订谬集》和《太平天国史事考》等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专集。

与以往的重印本相比，上述图书在内容和编撰体例上独具特色。一是附有“自序”“后记”“跋”等作者自我评述性文章，用以交待著作缘由、研究脉络和轨迹，让读者更好了解其学术旨趣和出版背景。譬如，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后记”称，收入这部文集的8篇论文都是作者在“解放以后的几年中写成的”，部分曾经先后在杂志报纸上发表过，但在结集出版时都作了一些修改：“所有收录这个集子中的论文，或多或少都作过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其中《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一文，连题目也改了。这篇

论文原来的题目是‘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因为论文的内容，不是全面地论述这个时代，只是集中讨论这一时期的经济，所以改换了这个题目。虽然改换了题目，但论文中引用的《红楼梦》中的资料仍然保留着，因为这些资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27]另一学者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则通过“自序”阐述了其收录论文的来龙去脉，指出这些作品有的公开发表过，但由于初稿写成时比较匆促，疏漏的地方很多，而且由于在发表后又陆续获得了些新材料，故在结集出版时对其中的内容加以修改：“例如关于制陶史和炼铜史的两篇，由于近年来我国考古学者的努力，我国的物质文化史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几方面增加了无数的新材料，这就几乎不得不把初稿完全改写了。其他各篇，如果和初稿一比，就可看出增改的地方是不少的。”^[28]

二是撰写“出版者的话”和“前言”等出版说明，用以介绍著述内容，其中对著作的优缺点展开讨论，其切中肯綮的评述为读者提供了有益的阅读指导。如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在三联书店重印出版时，作者已经辞世，故该书的编辑通过“出版者的话”这一具有书评性质的短文形式，对其内容进行评述。一方面指出其优点是“作者对秦汉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史实就他自己的历史观点作了一番比较严格的选择取舍，经过他自己的融会贯通，用生动通俗的文字写了出来。作者对被剥削被压迫者有一定的同情心，对中国历史发展上有一定贡献的人物有颂扬，对残暴的统治者与剥削制度有憎恨”；另一方面又指出其缺点是“作者完全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阐述。这就使本书的读者不能从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中看到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决定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29]又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再版时，通过其侄子戈宝权执笔撰写的“前言”，叙述

作者生平、撰写历程，并对该书的价值作评述：“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系写于二十八年前，从观点上看当然不是一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成的书，同时在论点上也一定全然正确，但其中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因此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只能用批判的眼光和把它当作史料来使用。”^[30]以上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者借助“出版者的话”“前言”等书评性文字，发挥其导读作用，启发并提高读者对其中内容和观点的辨别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出书的目的和意图。

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联书店版历史类学术图书阐扬的唯物史观内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就把唯物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列入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议题。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31]。其中所提及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即为唯物史观。当时广大的史学工作者积极响应这一政策，陆续开展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据此，郭沫若在1951年7月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我国史学已经发生转向，其中第一个表现即是“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以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32]。1953年7月，刘大年对这种史学范式的转变加以更为具体的阐述，“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33]。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图书尤其是历史类马克思主义学术专著出版却成为了人民出版事业的短板。当

时, 社会各界急需学术图书, 根据原出版总署在 1952 年调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结果显示, “目前广大读者最需要的是: 一、理论思想教育的书; 二、科学技术书; 三、描写工农兵生活的真正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艺创作; 四、文化教育的书。前三类书, 不论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 都极需要。”^[34] 时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 1954 年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也承认说, “国家出版机关所出版的书籍, 范围狭窄, 种类贫乏, 如历史、古典、文艺著作、教学参考书、辞书及其他工具书, 群众需要的数量很大, 我们出得很少, 甚至没有”^[35]。为解决这一困境, 三联书店积极承担了学术图书出版任务, 除重印部分近现代传统学者的学术著作外, 还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 其中很多是从民主革命阶段走过来的历史学者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对唯物史观有了新的理解并以此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

此时三联书店版的历史类马克思主义学术图书, 作为唯物史观话语与中国历史研究结合的产物, 非常强调唯物史观、毛泽东思想对于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尚钺作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在新中国初期加强理论学习后指出, 史学研究应以毛泽东科学论断为指导, “站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立场上”, 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即体现了这一点, 要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作较多方面的探索, 并提出我所能接触到的材料和现象, 以供国内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起码垫脚石”^[36]。而吕振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参与社会史论战, 并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 但此时的他注意到新中国以来形势和任务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及毛泽东又发展了其自身关于民族的理论, “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 拿来和我们现实的具体情况现实的斗争任务

相结合, 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 就正是与中国具体情况具体斗争任务相结合的列宁、斯大林的学说”^[37], 因此, 1950 年增订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即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对原先的观点加以修改、完善, “以期能予新形势下新的方针任务的指导原则相适应, 与当前的革命实践相适应”^[38]。

同时, 三联书店版的传统历史考证史家著述增订本及新作, 也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研究成果。邓广铭作为傅斯年的弟子, 是 20 世纪 40 年代成名的历史考证学家, 其《宋史职官志考证》被时人誉为“其用力之勤, 持论之慎, 并世治宋史者, 未能或之先也”^[39]。在新中国成立后, 他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都稍稍有了一些转变和提高”, 批判自己在 1944 年撰写的《岳飞》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仅仅是“一知半解”, “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 自然还都是陈旧、落后乃至反动的老一套。而在史实的考订方面, 对于旧史籍中的谬误的纠正, 为数也很有限”。而到了 1954 年增订出版《岳飞传》时, “对于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些问题, 全都做出了与《岳飞》当中大不相同的处理。对于旧史籍中的记载, 也进一步做了不少订正”^[40]。又如唐长孺, 解放前曾认真研读、模仿过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历史考据文章, 在新中国成立后认为自己“过去所受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 在史学研究中“一接触问题的本质, 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 不能作深入的追寻”, 为“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 他自觉用马列主义指导“清洗”其过去的思想遗毒^[41], 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 年出版时修改了大量旧稿, 主动“清洗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 以期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学到家”^[42]。

至于将学术争鸣文章汇编成册的专题论文集, 其议题本身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历

史理论而展开的中国历史问题论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辑》便是如此，该书编者认为其编辑用意即为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国内历史学者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于他们的成绩，应该加以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件工作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认为，首先把散见于各报章、杂志上有关的文章搜集起来，编印出版，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历史工作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文章，选出二十五篇编辑了这本集子”^[43]。又如《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编者指出，“汉民族形成问题，是我国史学界争论未决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过去曾有人提出过，一九五四年范文澜先生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重新提出，引起了史学界更多的注意，初步展开了讨论，几年来在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将它们搜集起来，编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供大家参考，促使这一问题更深入地讨论下去”^[44]。

总之，这些三联书店版历史类学术图书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结合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试图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各分支学科话语体系。譬如，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在远古社会研究方面“做最大的努力”，“逐步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以期“从批判过去的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中，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体系”^[45]；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对中国化学史研究开展“一种大胆的尝试”，以期写成“一册具有相当系统的中国化学史专书”^[46]；《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收集了自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发表以来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鸣的代表性文章，以期“促使这一问题更深入地讨论下去”^[47]；《中国历史人物论集》搜集、整理了20篇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评论文章，在“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指正和批评”的同时，以期引导学界对此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进而“有更好更多的有关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著出现”^[48]。由于比较精确地把握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等唯物史观话语的基本范畴，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图书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专题研究领域开拓之作的同时，成为了时人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范本，成就了一代学术经典。黄绍湘《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49]，陈翰笙就认为它“充分的证明”只有十月革命实现了消灭剥削制度“这个历史的真理”^[50]；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后增订改名为《新石器时代》），是学界“探索新石器时代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的代表作”^[5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得到了以考据见长的史家陈寅恪的赞许，认为这是在唯物史观为指导下撰写而成的史学佳作，“独诵尊作辄为心折”^[52]。

4 余 论

三联书店版的历史类学术图书在阐扬唯物史观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如若结合当时出版界整体情况看，那么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则显得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众多私营出版社开始转型和专业化，使得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出版活力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对此，曾彦修回忆说，在1954年，“解放后就关了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此时还没有恢复。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甚至在中国，只有三家出版社，一个是人民出版社，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个附属少儿出版社。当时每个省已经有个人民出版社，但它们一方

面是印刷中央文件，一方面是出通俗读物，真正的出版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53]。这其中，人民出版社和副牌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把社会科学的书全包了”。由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各有分工，人民出版社只出版解放前就已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范文澜、胡绳等少数几个人的著作。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旧史家的著作，虽说在数

量和种类上都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只能交由三联书店出版。由此来看，三联书店可视为当时历史类学术图书出版最为主要的机构。也正是它的开门办社，主动约稿，史学界才能在当时出版了如此多的高质量历史类学术图书。因此，三联书店版历史类学术图书，对于助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学科的确立，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力量。

注 释

- [1][4]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258, 190
- [2]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154
- [3][18][21][22][23][24][35]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6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169, 195, 193, 195, 195, 196, 156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9—1949)(下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795
- [6][7][8][9][10][11][13][19][25][26] 仲秋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64, 73, 74, 123, 216, 221, 81, 174, 174, 1370
- [12][14] 华岗. 增订本序言, 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M]. 上海: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1, 2
- [15] 华岗. 增订版序,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M]. 上海: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1: 1
- [16]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352
- [17]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499
- [20][34] 袁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4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91, 204
- [27] 翦伯赞. 后记, 历史问题论丛[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195-196
- [28][46] 袁翰青. 自序, 中国化学史论文集[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2, 1
- [29] 张荫麟. 中国史纲上古篇[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1
- [30] 戈宝权. 前言, 中国报学史[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3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9
- [32] 郭沫若. 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N]. 大公报(上海)副刊“史学周刊”, 1951-09-28
- [33] 刘大年. 中国历史科学现状[N]. 光明日报, 1953-07-22
- [36] 尚钺. 作者的话, 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9
- [37][38] 吕振羽. 增订版序, 中国民族简史[M]. 上海: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21-22, 4
- [39]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77
- [40] 邓广铭. 自序, 岳飞传[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2
- [41][42] 唐长孺. 跋语,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451, 452
- [43]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者的话,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集[C],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1
- [44][47]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者的话, 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C],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 [45] 尹达. 后记, 中国新石器时代[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155
- [48] 李光壁, 钱君晔. 编后语, 中国历史人物论集[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372
- [49][50] 陈翰笙. 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N]. 光明日报副刊“图书评论”, 1954-01-30
- [51] 谢保成. 尹达先生之路: “从考古到史学研究”[J], 大连大学学报, 2008(2)
- [52] 陈寅恪. 陈寅恪集·书信集[M]. 北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77
- [53] 曾彦修口述; 李晋西整理. 曾彦修访谈录[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173

(收稿日期: 2022-07-03)